

中国古代文化漫谈：再认识《三国演义》

《三国演义》中“三顾茅庐”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但对此事的看法各有不同。有人说诸葛亮是在测试刘备求贤的决心，有人说诸葛亮在抬高自己的身价，其实现代人喜欢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衡量古人，而“三顾茅庐”中实际蕴含的道理却离现代人越来越远了。现简述一二如下。

在刘备第二次去卧龙庄求见诸葛亮不遇后，曾留下一封书信。在信中刘备表达了自己“久慕高名”，但“两次晋谒，不遇空回，惆怅何似”的诚意。在略述了平生志向后，刘备希望诸葛亮可以出山辅佐，“展吕望之大才，施子房之鸿略”，并说自己要“斋戒薰沐”后再来拜访，其思贤若渴的心情跃然纸上。身为皇叔能如此礼贤下士，可以说仁至义尽了。从世俗观点看，诸葛亮应该受宠若惊，亲自去新野见皇叔才是。

诸葛亮在第一次上《出师表》时，对他当时的心态做出了解释。他说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



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这其中两个字，在修炼大法后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诸葛亮说的“苟全性命”其实并不简单地是保住自己的命，这里的“性”和“命”是分开的，而且“性”在“命”的前面。其中“性”就是指“本性，心性”，涵盖着他做人的原则，方式和气节等等，那是比“命”更重要的。

诸葛亮并非世俗中人，对于滚滚红尘中的名利色欲都看得极淡。在答应刘备出山后，他嘱咐弟弟诸葛均说：“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，不容不出。汝可躬耕于此，勿得荒芜田亩。待我功成之日，即当归隐。”后来诸葛亮因刘备托孤而鞠躬尽瘁，病死在五丈原，临终前他上表给后主刘禅说“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别无调度，随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别治生，以长尺寸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也。”

这就是诸葛亮的胸襟，他出山辅佐刘备并非为了功名利禄，为了人前显贵，光宗耀祖，而是为了顺应天意的安排，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这样淡泊名利的人在古代道德比较高尚的时候比比皆是，象在刘备三顾茅庐前后遇到的水镜先生，以及崔州平、石广元和孟公威等人，没有一个愿意跟刘备去做官打天下。并非是因为他们才学不济，而是因为他们更喜欢过恬淡的生活。而这种生活容易使人心如止水，进入修炼的状态。

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半神的文化，许多人乐天知命，宠辱不惊。他们深深知道历史自有它的安排和发展规律。崔州平与刘备论及“治乱”的道理后，对刘备说“顺天者逸，逆天者劳；数之所在，理不得而夺之；命之所在，人不得而强

之”。水镜先生在得知徐庶走马荐诸葛后“出门仰天大笑曰：‘卧龙虽得其主，不得其时，惜哉！’”其实，他们都能知道汉家江山气数已尽，无论谁都无力回天了。

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预言，叫“马前课”，描述了从三国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历史大事，其作者正是诸葛亮。所以说对于历史的走向，诸葛亮实际上了如指掌，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第一次与刘备纵论天下大计时，就准确地预言了三分天下的结局，并取出一幅地图，告诉刘备日后将在西蜀建国，与曹操、孙权鼎足而立。也能说明他为什么在《后出师表》中说“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”。他不便对后主明言，但完全清楚六出祁山实际上是“欲以只手将天补”，结局也只能是“何期历数到此终，长星半夜落山坞”。

现代人读《三国》，只能叹服诸葛亮的智慧和眼光。却实在想不出来，这样一个“躬耕陇亩”的村夫，相交的皆非达官显贵，而当时的资讯又不发达，他如何能那么详细地知道天下十几路诸侯的性格，势力和相互关系，又怎么能如此准确地预言三国鼎立的结局呢？其实，懂修炼的人都知道这种智慧其实远远超出了人的层次，达到了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所说的“不出户，知天下”的境界。而这种“知天下”却类似《转法轮》第二讲中提到的“遥视功能”或“宿命通功能”。

有许多事情的发生都带有戏剧性，而且匪夷所思。比如官渡之战，袁绍70万人马对战曹操7万人马，而且曹操粮草不济，眼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，就在这时，曹操用计烧了乌巢的粮草，击败了袁绍。赤壁之战，曹操拥雄兵83万，而孙刘

联军只有几万人马，眼看曹操即将一统天下，但一场火攻令他折戟沉沙，险些命丧华容。猇亭之战，刘备统兵70余万，而孙权只有几万人马，就在东吴将玉石俱焚之际，陆逊火烧连营700里，致使刘备败回白帝城。诸葛亮六出祁山，其中有三次几乎大获全胜，但突然遭遇大变而不得不中道而返，最后一次更苦心排下计策将司马懿父子三人困于上方谷中，点起地雷火器。谁料想“忽然狂风大作，黑气漫空，一声霹雳响处，骤雨倾盆。满谷之火，尽皆浇灭：地雷不震，火器无功……”。

每一次都是在千钧一发、退无可退的情况下，发生一件极其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并让历史在那里转折。这是因为神要达到三国鼎立的局面，不会让一个国家不到神安排的时间就覆灭，同时也在教导人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。正如《三国》结尾古风的最后四句诗一样“纷纷世事无穷尽，天数茫茫不可逃，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”。这四句诗应该说是《三国演义》的点睛之笔。无论是曹操、刘备还是孙权，他们手下的文臣武将表面上斗智斗勇，那只是为了符合人中的理而表现给人看的，其实是神安排下来的一种平衡，达到三国之间的军事上鼎足而立而已。

在修炼大法以前读《三国》的时候，关注的是一场场战斗的谋略，喜欢看诸葛亮与周瑜、曹操、司马懿斗智。修炼以后似乎更能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安排，更欣赏的是人物的品德操守，更能理解古人文天敬神时的谦卑，更能体会到作者在着书时匠心独运的地方，也更能看出神在安排这段历史时的细腻和严谨。◎

历史故事

富贵不易妻

尉迟敬德(585—658年)，名恭，字敬德，朔州善阳(今山西朔县)人，隋朝末年归顺唐朝。他参与了征王世充之役，曾枪挑敌将单雄信。后又随军征讨刘黑闼、徐元朗，于重围中救出秦王李世民，有显著战绩。玄武门之变中，尉迟敬德射杀了齐王元吉，立下头功。太宗继位后，封敬德为吴国公(后改封鄂国公)，与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同掌朝政。去世后赐谥号“忠武”。

据《资治通鉴·卷第一百九十五》记载，太宗因赏识他英勇忠贞，辅佐有功，曾经对敬德说：“朕想将女儿许配与卿为妻，不知意下

如何？”敬德叩头辞谢道：“臣妻虽然浅薄卑陋，但是臣与她共贫贱，历患难已多年；臣虽不学无术，但曾听说古人‘富不易妻’，臣愿效仿古人，不忍离弃老妻。”太宗听完尉迟敬德的肺腑之言，也就作罢。

与此事迹相仿的是汉朝宋弘的故事。

据《后汉书·卷二十六》记载，宋弘，字仲子，京兆长安人(今陕西省)。汉光武帝即位以后，官拜太中大夫。后来又做了大司空，被封为栒邑侯。他把自己所有的田地租税收入和俸禄，一并用来赡养九族中的人，因此家中并无资产，以清廉的德行而闻名。

当时正逢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丧夫寡居，光武帝念及姐弟之情，常请她入宫见面、聊天，也想再为姐姐找一个丈夫。一天，二人谈及朝中大臣。公主说，宋公威容德器，朝中无人能及。光武帝知道姐姐的意思后，就召见宋弘，让公主坐在一座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。光武帝对宋弘说：“俗语说：‘贵易妻，富易妻’。这是人之常情，卿可知朕的心意否？宋弘答道：“我听说‘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’”。听了这话，光武帝也就明白了宋弘的想法。于是他对公主说：“此事不成。”◎(史然)

成语故事

结草衔环

知恩图报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、感恩报德，至死不忘，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传统美德。成语“结草衔环”的典故不仅向我们讲述了成就这美德的两个感人至深的故事，还告诉我们“善有善报”是一亘古不变的天理。

“结草”的典故见于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。公元前594年的秋七月，秦桓公出兵伐晋，晋军和秦军在晋地辅氏(今陕西大荔县)交战，晋将魏颗与秦将杜回相遇，二人撕杀在一起，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魏颗突然见一老人用草编的绳子套住杜回，使这位堂堂的秦国大力士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，当场被魏颗所俘，使得魏颗在这次战役中大败秦师。

晋军获胜收兵后，当天夜里，魏颗在梦中见到那位白天为他结绳绊倒杜回的老人，老人说，我就是把你嫁走而没有让她为你父亲陪葬的那女子的父亲。我今天这样做是为了报答你的大恩大德！

原来，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位无儿子的爱妾。魏武子刚生病的时候嘱咐儿子魏颗说：“我死之后，你一定要把她嫁出去。”不久魏武子病重，又对魏颗说：“我死之后，一定要让她为我殉葬。”等到魏武子死后，魏颗没有把那爱妾杀死陪葬，而是把她嫁给了别人。魏颗说：“人在病重的时候，神智是昏乱不清的，我嫁此女，是依据父亲神智清醒时的吩咐。”

“衔环”典故则见于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中的注引《续齐谐记》，杨震父亲杨宝九岁时，在华阴山北，见一黄雀被老鹰所伤，坠落在树下，为蝼蚁所困。杨宝怜之，就将它带回家，放在巾箱中，只给它喂黄花，百日之后的一天，黄雀羽毛丰满，就飞走了。当夜，有一黄衣童子向杨宝拜谢说：“我是西王母的使者，君仁爱救拯，实感成济。”并以白环四枚赠与杨宝，说：“它可保佑君的子孙位列三公，为政清廉，处世行事象这玉环一样洁白无瑕。”

果如黄衣童子所言，杨宝的儿子杨震、孙子杨秉、曾孙杨赐、玄孙杨彪四代官职都官至太尉，而且都刚正不阿，为政清廉，他们的美德为后人所传诵。

后世将“结草”“衔环”合在一起，流传至今，比喻感恩报德，至死不忘。◎(史然)

名山古寺

仙灵所隐的寺庙——灵隐寺

灵隐寺始建于东晋(公元326年)，到现在已有1,600多年历史。中国佛教着名十大寺庙之一。位于西湖之西，北高峰与飞来峰之间。五代吴越时，规模宏大建有九楼、十八阁、七十二殿堂，房屋过1,300余间，僧众达3千人。

据《灵隐寺志》载：“创于(东晋)咸和元年竺僧慧理，山门始榜曰：‘绝胜觉场’，山翁葛洪所书，正殿日觉皇殿……，宋景德四年(公元1007年)改景德灵隐禅寺”。明初重建，改称灵隐寺。清康熙二十八年，圣祖来寺

题额赐名“云林禅寺”。

当年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见飞来峰叹道：“此天竺灵鹫山之小岭，不知何年飞来？佛在世日，多为仙灵所隐。”遂面山建寺，取名“灵隐”。而飞来峰却有无石不奇，无树不古，无洞不幽，秀丽绝伦，其景观与周围诸峰迥异之处。

灵隐寺内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和大雄宝殿。天王殿入口的弥勒佛坐像，已有200年历史，弥勒佛背后的护法天神韦驮像为整块香樟木雕刻的南宋(1127—1279)时作品。大雄宝殿高33.6

米，是现存最好的单层重檐寺院建筑之一。殿内正中有贴金释迦牟尼像，净高9.1米，加上莲花底座和佛光顶盘，高达19.69米，坐像用24块香樟木拼雕而成，精细而庄严。大殿两侧分列“二十诸天”和“十二圆觉”像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殿后侧有海岛立体群塑，共有浮雕150多尊。

提起灵隐寺，人们自然会想起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和尚：济公。济公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，生于南宋绍兴十八年(公元1148年)，卒于嘉定二年(公元1209年)，原名李心远，法名济公，浙江台州人，是当时天台临海都尉李文和的远房孙。他剃度出家的地方就是灵隐寺。他的行径被传说渲染得离奇古怪。事实上，济公是一位性格率真而颇有神通功能的名僧。但济公行径与一般出家僧人大不相同。据记载，济公性格不居常规，偶尔饮酒食肉，行若颠疯，与一般寺僧格格不入，监寺不能相容他，被迫离开灵隐寺而到了净慈寺。“古井运木”的故事便发生在净慈寺。他在净慈寺度过了余生，一直到端坐而逝。济公非常热心，乐于助人，寺中有老病僧人，他常为之采办药石。行游时为市人诵经下火，解忧排难，常常灵验，因此为人传诵。济公一生飘逸，喜好云游，出行四方，足迹遍及浙、皖、蜀等地，衣衫不整，寝食无定，神来鬼去，人莫能测，疯疯癫癫，故又被世人称为“济颠”。

济公的出现验证了灵隐寺的“仙灵所隐”。济公的遭遇也为我们带来启示，就是不能用常规的眼光去评判一个人或一个新生事物，否则就易于失之偏颇。我们当今世上也有许多看似平常普通之人，也许“不普通”就隐藏在“普通”之中，正所谓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”◎(天新)

